

● 刘惠平

图书馆政治文化功能的历史考察

摘要 图书馆的历史表明,它不是中性文化机构,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功能。这是因为图书典籍从产生起就具有政治文化性,而图书馆则是“移植”政治文化的场所,并使政治文化得以社会化。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图书馆 政治文化 历史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library indicates that library is not a neutral cultural institution, but has a strong fun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This is because books have strong origins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library is a place to “transplant” and socialise political culture. 14 refs.

KEY WORDS Library. Political culture. History.

CLASS NUMBER G250

目前,国内外对图书馆的研究大多是从图书馆学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角度出发,但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单位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功能要我们加以注意。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考察论证。

1 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一概念是1956年由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政治家阿尔蒙德(G. Almond)首次提出的,他说:“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1]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逐步恢复,不少学者开始涉足于政治文化研究领域。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与文化的保存与传递场所,它不仅是完成文献的收藏与整理,信息的传播与加工,也不仅是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文献收藏和使用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得以完成,作为社会意识实现和传递的物质载体,它在本质上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社会精神”的移植。图书馆并不仅仅是一种多种知识传播的物质形式,在内容上图书馆是对人类思想言行

的各项记录的加工和整理,所以,应以整个社会运作系统来考察图书馆的功能。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反对仅仅从技术上考察图书馆,认为应“将图书馆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记忆’或‘社会精神’的移植过程。正如迈特尔所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2]图书是人类思想的物质载体,图书馆则通过有组织收藏与保护这种物质载体来传递人类的思想,使现代人的思想中接受这种文化和知识。显然,思想与知识是图书馆的灵魂,而图书和图书馆只是使思想和知识得以传递的外在形式。这也正如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所认为的,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则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3]。

“社会精神”或是“客观精神”都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历史图书所反映的是以往历史阶段的社会意识,记载着过去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而今天的图书则反映着当代人的趣味、心态、伦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图书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载体,图书馆则是“移植”这种政治文化的场所。

其次,图书馆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兰

顿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把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过程。而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学校是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图书馆作为无围墙的大学,作为公民的终身课堂必然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它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图书馆所发挥的教育功能中,政治文化始终是其主导的方面。通过在图书馆的学习,引导读者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政治观念的形成对人的政治素质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看法,即对政治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看法。图书馆在举办各种展览、书评等许多方面,都是围绕使读者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而展开的。

掌握政治知识也是图书馆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知识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知识既包括对以往政治生活的历史总结,也包括现实政治活动的信息。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知识都是政治知识的重要内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是离不开政治知识传播这一内容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其全部工作都是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展开的,这无疑对培养读者的政治知识产生无形的影响。

图书馆正是通过发挥自己的教育功能起到了社会教化作用,从而使政治文化得以社会化,并提高了读者个体政治认知能力,即通过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不断形成对政治现象一般规律的认识,培养一定的分析政治现象复杂性的独特的政治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过程中,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政治知识,从而使政治文化通过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工作完成了其社会化过程。

2 图书典籍从产生起就具有政治文化性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创造。中国文字作为表意文字从其产生就是一种文化样式。《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

哭。”《春秋无命者》:“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鸡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仓颉造字的传说,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文字的这种文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文化。

甲骨文大多是商朝的占卜记录,因此又称卜辞。《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称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夏代已有青铜器,人们把这种铸或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称“钟鼎文”、“金文”、“铭文”。在西周时代,周王依靠宗法分封制牢固掌握着国家政权。当时的文字也垄断在贵族、政府部门及为他们服务的丞、史、卜、祝的手中。刻在周王室的主要器皿——青铜器上的汉字即铭文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据史书记载,周王封赐诸侯大夫时要赐予重器,即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作为信符和标志。各诸侯国世传的“重器”成了其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当一个诸侯国灭亡时,更要“迁其重器”。《左传·昭公十五年》:“诸侯之封地,皆受明器于王室。”

此外还有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如石鼓文、碑文、石经等,还有刻在竹木上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礼记·中庸》)。先秦记载的文字不论载体是什么,都与政治文化相关联。

有了文字,有了记录文字的各种物质载体,图书就产生了。在中国,广义的典籍(包括图书、文书、档案),起源于商代。《隋书·经籍志》:“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举焉。”

图书和典籍从产生时起就是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符号,传播政治文化的工具,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教化、扩大其政治影响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商代甲骨文记载的内容有祭祀、征战、天时、年成、王事、旬夕等,其中社会斗争、政治文化是其主要的內容。在社会政治斗争中,王室为了维

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有因王事、外交而发布的政令、条约,以显示王权的权威;有征收赋税、接纳贡物的记载,以维护王室的经济收入;而对外征战,对外交涉,则是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记录;军令信物、军事活动的记录则表达了王室的威力和政治意向。所以古代典籍中的政治内容是十分重要的,正是通过这些政治活动,王室更迭、对外战争,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以及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

不仅是内容,其实中国文字从出现时起就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意识,例如《说文解字·示部》解释“示”字:“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反映了汉以后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又如“王”字,《说文解字·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通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个解释说,早期“王”字的产生体现了诸儒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强烈地表现出了一种政治价值取向。

就图书和典籍的收藏历史来看,学术界大都认为中国的图书馆起源于周朝的史官。周王朝建立后,为治理政治事务,记录朝廷时事,办理王室公文,传达政令,掌管文书档案,分别设了不同的史官。史官的设立和职司就成为图书馆、档案馆建立的重要条件,也可以说有了史官,就有了古代的图书馆、档案馆。《文献通考·经籍考》:“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

中国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周朝的图书馆是王权的一个机构,保管文献、典籍图书的目的是为了辅助政治统治。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周仪“大史掌建邦之天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史记·封禅书》记秦穆公立,“史书而记,藏之府”。这个“府”当然是秦国之“府”。这就点明了古代图书馆的性质,说明了史官作为一种文化性质的官员其职责就是记录、传播当时政治要令,完成

其政治文化的社会化。

3 封建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灵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其社会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依据这一原理,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出封建社会的图书馆和藏书直接受其政治制度的影响,政治文化成为其图书馆和藏书的灵魂。这点在秦代的焚书事件和清代的图书政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建立了多处宫廷和政府机构的图书馆,形成了秦王朝官府的藏书体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大宴群臣,议朝政。博士官淳于越主张师古法,分封诸侯,恢复封建割据局面。秦始皇的重臣李斯当即反对,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师古法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的加强,于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4]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于是焚诗书,禁私学,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接着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焚书坑儒直接摧毁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的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严重压抑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先代遗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的烧毁,对中国文化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司马迁慨叹:“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5]

如从政治文化角度来审视这一事件,它十分明确地揭示了秦始皇藏书的政治倾向,说明政治文化对其藏书政策的影响。秦始皇所以这样做是为巩固秦王朝政权,为统一舆律,打击各诸侯国的政治势力残余,扩大新政权的政治影响力。这说明图书馆及藏书当时都受其政治的影响,都是被其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清朝的图书政策和法令最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藏书受其政治文化的支配。清朝统治

者入关以后,为巩固统治,使汉人归化,仍采取尊孔重儒的文化路线,对孔子尊奉备至,对理学儒生则委以重任以辅佐其政治。清统治者对儒家书籍是大开绿灯的。每次求书,都把“经学史乘,实有关学修齐治平,助成德化”的儒家书籍放在首位。这正如周永年所写:“儒藏既立,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6]正因为此,清代刊印的书多为《五经》、《四书》、《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和御纂的《性理精义》等,而将反程朱理学的学术著作称为“讥讪先贤,崇尚异说,得罪名教。”

一方面是大量刊印程朱理学的书,另一方面是乘编纂《四库全书》时查缴禁书。这一活动的目的被乾隆皇帝一言道破:“明季未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7]

初期禁书时还仅限于明末清初的野史稗乘,但随着发展,范围日益扩大。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之书,凡有碍、有损于清政府的都要查缴,这是一场浩大的文化劫难。编修《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所谓“每进一编,必经亲监,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四库全书总目》更公开声明:“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掎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8]为加强清王朝的统治,编纂者把《儒家经典》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异端思想严厉苛刻,对论理纲常的宣扬提倡也更加不遗余力。认为佛、道、天主教以及词曲一类是“倚声填词之作”,对于这些著作则“凛遵谕旨,一字不收。”^[9]对于科学技术的书,则认为“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完诘,抑或卑琐微末,不是编摩”。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样的优秀著作都未收入。

清廷编修《四库全书》,表面上打着“稽古右文”的幌子,实际上包藏着“寓禁于征”的目的。因此,这部书的编修一方面整理并保存了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也摧毁了一部分最具有爱

国思想的典籍。《四库全书》的编纂明显表现出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意识,这一活动是其政治文化支配的结果。章炳麟指出:“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10]乾隆完全是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信统统烧毁,因而《四库全书》编修的过程也就成为文化被摧残的过程。

鲁迅先生说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剝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之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11]

4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政治倾向

1840年以后,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改良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陈守旧法必亡,必须另拓新路,这就是学习西方,提倡变法,启迪民智,振兴中华。

将旧式的藏书楼变为近代的图书馆,将图书馆作为宣传变法、改良的阵地,这是改良主义者的一个目标,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创立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强学会首先着手办的就是图书馆和报纸。强学会设有“书藏”,陈列图书供大众阅读,开放的对象已不是帝王和贵族,而是一般民众。梁启超将“开大图书馆”作为强学会所做的5件大事之一。此时强学会的“书藏”已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在强学会的影响下,1896~1898两年间国内成立学会87所,学堂132所,报馆91所,许多书楼也由

此诞生。这些书楼虽还不是完备的近代图书馆,但已与藏书楼有了重大区别:在读者对象上已是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藏书内容也改变了过去仅仅经史子集的内容,补充了西学、新学的书籍;管理制度上逐渐脱离了私人藏书楼的束缚,采取了稍微有秩序的管理方法。

令人感兴趣的是改良主义对书楼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图书馆思想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倾向,再次有力证明图书馆与政治文化的内在关联。改良主义对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强调救国必先治学,治学必创设藏书楼,突出图书馆在变革中的作用。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学为功。”尤其是以后的严复,开一代译风,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书籍。有了译书,他们就主张将藏书楼变为公共图书馆,公开借阅,促进西方文化的传播。这样把图书馆与译书和宣传西方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二是检讨封建藏书楼的得失,说明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如1904年长沙知识界筹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湖南巡抚庞鸿书认为图书馆“度藏群籍,输进文明,于劝学育才,大有裨益”^[12]。1909年,学部奏建京师图书馆,称“图书馆为学生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13]这些都是将图书馆的兴建与旧时的藏书楼作对比,强调其启迪民智,复兴中华的主旨。

三是宣传、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详细介绍了西方的图书馆,说明中国图书事业的落后,评价封建主义的藏书楼,强调只有建近代的图书馆才能使西洋文化得以传播,从而启迪民众。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与改良

主义、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政治主张是紧密相联的。所有改良主义者都把图书馆作为其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将图书馆作为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点的中心。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4]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表现在它的选书、藏书政策上。中国图书馆的历史雄辩证明了图书馆决不是一个中性文化机构,它有着强烈的政治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 1 G. A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8V. Ang 1956 393P
- 2 Pierce Butle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 3 Karstedt Studien Zur Soziologie der Bibliothek Wesbaden: Harrassowitz, 1954
- 4 司马迁 史记·六国年表序
- 5, 6 周永年 儒藏说 见: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上谕
- 8, 9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凡例
- 10 章太炎 哀焚书 见:章太炎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1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见: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2 湘抚庞鸿书奏建图书馆摺 见: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 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摺 见: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4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刘惠平 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通讯地址:北京白石桥路39号。邮编 100081。

(来稿时间:1999-05-27。编发者:刘喜申)